

据《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下称《蓝皮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网络历史类小说中穿越、架空占比较大;幻想类作品继续保持在网络文学总体格局中的数量优势。而《蓝皮书》中列举的部分幻想类作品,如《天道图书馆》《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等,在其内容中也包含了“穿越”这一具有强烈幻想色彩的情节模式。结合中国网络小说的发展历程,占据幻想类作品主流地位的“玄幻”小说与出身于历史、言情小说的“穿越”小说共同繁荣的发展现状表明,穿越小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演变,已经在许多方面扩展了原本“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的写作范式。同时,在中国网络小说海外输出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发展背景下,部分日本网络小说在情节设计、表现手法等方面与中国网络穿越小说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相似性。其中的“重生”、“转生”等具有“穿越”特色的相关描写也都能够在网络穿越小说题材中找到相对应的元素和作品。这一现象背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影响与接受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究。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近期出现的此类小说大多用“异世界转生”来描述小说中包含的“穿越”情节。通过考察其大致内容,笔者发现,此类小说中的“异世界转生”情节模式与中国“穿越”题材下“转生”分支的定义非常接近。而所谓的“转生”,指的是小说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失去自己原本的身份,仅保留有意识穿越到另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即“异世界”。本文主要针对中日网络穿越小说中具有相似性的“穿越”题材与“异世界转生”题材中包含的文化元素进行横向比较,并尝试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其表现出的差异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探究与解释。

文化元素差异

相较于欧美,虽然日本与中国具有相同的文化起源,但在日本网络穿越小说中,主人公穿越后的世界大多通过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奇幻”元素来加以表现;而中国网络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则往往穿越到一个以“仙侠”、“武林”为主导的“玄幻”世界。“奇幻”元素指包含了西方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的文化元素,如《天启预报》《无光主宰》《我乃路易十四》中对有关“巫师”、“魔法”、“国王”等西方神话传说和中世纪历史要素的展现。而“玄幻”元素则指基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融合了“修仙”、“道术”、“武功”等描写的文化元素。江湖谋略(如《剑来》《平天策》等作品)、武林功夫(如《牧神记》等作品)、得道修仙(如《吞天记》等作品)均可称为“玄幻”。

针对中国穿越小说中包含的文化元素,出版人沈浩波首先认为,“男性穿越小说不容易被市场接受,因为男性的消费通常比较理性。而女性相对感性许多,所以穿越小说在玄幻上没红,在言情上却红了。”但事实是,近期涌现出的许多优秀的网络穿越小说,其表现形式逐渐脱离了言情小说和历史小说的限制,读者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女性读者群体。以男性为主角,包含“玄幻”元素的穿越小说在网络小说市场中日益增多,大有分庭抗礼之势。截至2020年6月26日,根据起点中文网的搜索结果,当键入关键词“穿越”后,数量最多的搜索结果是“玄幻”(10944部),而“古代言情”(4441部)、“历史”(3158部)则分别位居第三、第四名。同时,在穿越总榜单的前十名中,有4部穿越小说包含了“玄幻”的文化元素。可见,“玄幻”元素在近期网络穿越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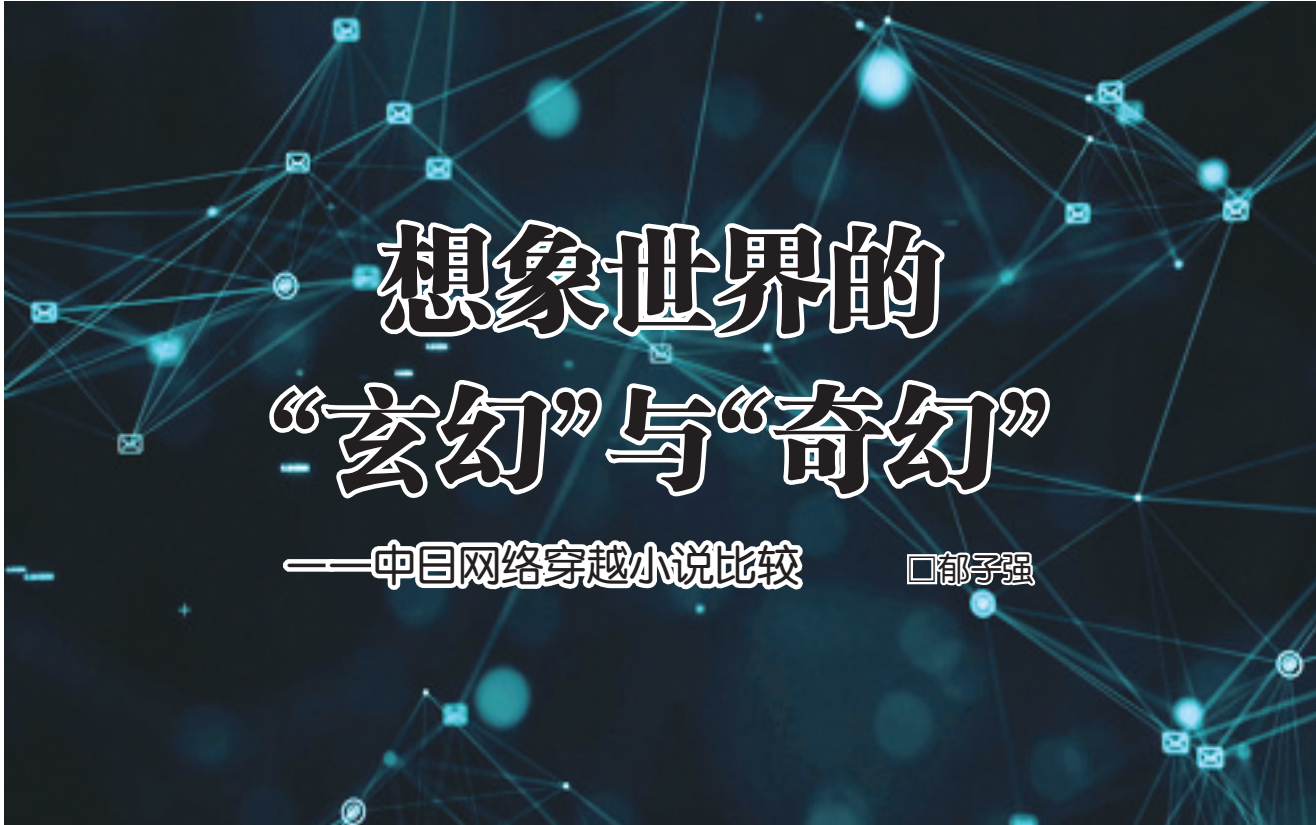
以起点中文网位居穿越小说榜首的《神门》为例,主人公方正直所穿越到的“古代世界”就是一个相当标准的“玄幻”世界。在《神门》的世界中,男性的姓名一般都是“正直”、“阳平”,女性要叫“雪莲”、“玉儿”。主人公实力成长的方式也是通过读书来体悟“万物之道”。而从作者“新意”对《神门》中新世界的描写可以发现,主人公穿越到的并非中国历史上的

有一个老问题:为什么“网络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或者说“文体”(Style)?除了强调数字媒介的交互性带来的写作狂欢之外,20多年网络文学的写作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数字文化传统”。这就可以从网络文学的写作伦理角度来探讨其文体属性,并由此重新确立网络文学写作的“精品意识”。

“新穷人”与网络文学写作的匮乏机制

网络文学的写作伦理可以总结为“自然、自在、自治”。这种写作伦理的核心特点就是齐泽克总结出来的拉康的说法:“涉及欲望决不让步。”其后果就是在写作的欲望生长过程中,创造出“想象界的大爆发”情形。正典文学写作是在理性启蒙主义的潮流中确立的,其想象力受制于理性启蒙的总体计划。而网络文学的想象界大爆发则暗合对正典写作伦理的疏离态势。网络作家写作一方面可以吸收和继承正典文学的成绩,自觉学习其文风和风格,另一方面,又总是与正典文学保持差异。

同时,这种想象界的大爆发形成了网络文学写作的“匮乏机制”,即网络文学的欲望性写作伦理,正是现实生活的匮乏性在场。《重任》这部穿越小说描述了小列车员崛起为铁路高管的过程。现代社会日益复杂,人们容易产生“预先失败”的沮丧感,这部小说则给人们带来掌控当代生活的“全景知识幻觉”——穿越者的内在含义不就是弥合人的历史感的掌控力不足的缺憾吗?网络文学通过这种“匮乏机制”实现着与当下生活的“潜对话”:即每一部网络文学作品中的欲望狂写都是当下社会生活总体匮乏意识的寓言化表达。这与传统文学经典所谓真实反映现实历史生活的情形截然不同。2019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数据表明,个人收入结构上,超过7成网友月收入不足5000元。无收入及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9%,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为33.4%;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7.2%。显然,网络消费群体主要是当代中国的“新穷人阶层”。从理论上讲,这一阶层的人们,其购买力足以支撑基本生活,如米面,却无力实现欲望满足,如豪车大



某一朝代,而是一个充斥着玄幻元素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物的姓名与主人公的成长方式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武侠、修仙色彩。其中,主人公对穿越后的世界存在着如下的感慨:“……来到这世界快一个月了,一问之下这里完全没有科举,什么八股文,什么四书五经完全没有!不同的世界,连家禽都长得不一样。”而这一描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穿越题材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同自身早期的风格产生了较大差异,想象也更加天马行空,不受拘束。

日本网络穿越小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大致相同,但在日本的网络穿越小说中,更具西方特色的“奇幻”元素显得更加突出。按照“成为小说家吧”(小说家になろう)网站对小说的分类方式,截至2020年6月28日,在其评分总榜排名前50名中,有39部网络小说使用了“异世界转生”或“异世界转移”的分类标签。而在这39部小说中,有37部小说都在情节中包含“奇幻”元素。由此看来,包含“奇幻”元素的“异世界转生”系穿越小说已经占据了日本网络穿越小说的主导位置,甚至在整个日本网络小说领域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而从整体上看,日本网络穿越小说中的确存在部分基于日本本土文化而创作的小说,如排名第198名的《战国小町苦劳谭》就是基于日本的“战国”元素而创作的穿越小说。但此类穿越小说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也很少有佳作出现。

“奇幻”元素最初发源于欧美,随一战后美国科幻小说的兴起而逐步影响日本、中国的小说创作。随着“转生”这一穿越题材在中日网络穿越小说领域的兴起,原有的“奇幻”元素也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于小说的创作当中。但问题在于,不同于中国网络穿越小说中对“玄幻”元素的广泛运用,日本网络穿越小说近期并未出现以典型“日式奇幻”元素为核心的作品。无论是在“成为小说家吧”位居人气榜首的《关于我转生成史莱姆这档事》,还是在评分总榜前300名中唯一出现的基于日本“战国”文化的《战国小町苦劳谭》中,源自日本的文化元素均来自欧美的“奇幻”元素始终彼此分离。以位居榜首的《关于我转生成史莱姆这档事》为例,异世界中各人物的姓名都非常明确地采用了西方式的名称,如利姆鲁·维尔多拉等等。而其中存在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如史莱

姆、龙、哥布林、精灵等魔物种族与人类种族之间的对立设计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西方“奇幻”特色。虽然在小说文本中也出现了来自日本神话传说的“鬼人”、“武士”等形象,但与源自西方中世纪神话传说中的各类形象和元素相比,这些来自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形象所占比例非常低,整个异世界的架构依然是源自西方的奇幻式结构。

题材差异原因

笔者认为,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可能与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网络穿越小说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当来自欧美的“奇幻”元素逐步进入中国网络小说市场时,一方面,中国神话传说、志怪传奇中对于“穿越”这一想象的论述为穿越小说作者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情节结构。诸如“樵夫烂柯”、“刘阮遇仙”等神话传说都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早期穿越小说“古穿今”的穿越模式。另一方面,来自欧美的科幻、奇幻小说也再度激发了穿越小说作家对“时空穿越”的想象。但在穿越小说兴起的2008年以前,中国网络穿越小说作家受言情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影响较大,相较于选择当时尚处于起步阶段、水土不服的中国本土“奇幻”,中国网络穿越小说的作者选择以“言情小说”和“历史小说”这两个已经发展成熟的载体来承载“穿越”这一新题材更加具有合理性,其间诞生的《寻秦记》《穿越时空的爱恋》也被认为开启了“历史穿越小说”与“言情穿越小说”的创作范式。而在2008年以后,中国网络文学早期对西方奇幻小说单纯模仿的时代早已过去,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成分的“玄幻”元素逐渐发展成熟并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包容性。穿越小说作者在两相权衡之后,更可能选择自身较为熟悉,且更受读者欢迎的玄幻元素进行穿越小说的创作。同时,在网络文学作品高度类型化的今天,抓住已经不再流行且本身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奇幻”元素大做文章,也很难再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在这样一种更加开放、读者群体更加积极的网络环境中,“穿越”这一题材与“玄幻”元素的结合就具有更高的可能性。

在日本网络穿越小说中,作者在文本中格外注意表现

“异世界”的“虚构性”以及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性”。笔者认为,这一特点很可能受到了日本文化传统和日本网络小说读者的共同影响。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化中对于“现在”、“此处”(现实世界)的强调同“向往彼世”(想象世界)的心理并行不悖。这一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并置的文化心理使得小说作者往往会采用截然不同的文化元素来表现主人公穿越前后的世界。例如,不同于中国网络穿越小说中本土文化元素“武侠”与来自西方的“奇幻”元素的自然融合,来自日本本土的“神怪”、“武士”等文化元素在很大程度上仍会被日本读者感知为现实世界的文化元素,很难与脱离现实的“奇幻”元素相互融合。既然如此,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如果采用日本的文化元素来塑造小说主人公转生到的“异世界”,那么主人公的转生历程更像是一次在现实世界中的“历险”而非具有强烈幻想色彩的“穿越”。

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作为日本网络穿越小说主要受众的御宅族(亚文化爱好者),对小说情节的虚构性也提出了相对较高的要求。日本评论家大塚英志曾对御宅族的接受视角做出如下评论:“(御宅族)尝试着在动画中构建一个令人深信不疑的‘现实’……达到了在其内部构建假想历史的地步。”大塚英志的评论表明,御宅族不仅需要穿越小说的作者充分表现出“异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还需要为“异世界”塑造一个严谨而完整、能够相互印证、犹如现实历史的叙事逻辑。结合上文中对日本文化心理的介绍,可以认为在这一接受背景下,采用日本文化元素来构建异世界不仅困难,也不太可能会受到读者的青睐,而来自西方的“奇幻”元素较于日本本土的文化元素在构筑异世界上就显得更具优势。

有关大众文化的演变,大众文化理论家菲斯克认为:“许多大众文化都是短暂的——随着人们的社会环境的改变,文本和趣味也会改变。”而随着中外网络文学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穿越”这一题材也在与读者的不断互动中发生了迅速而显著的转变。笔者认为,相关研究者在面对这一转变时不应用“一刀切”的做法将数量庞大的网络穿越小说一概而论,而应该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国网络穿越小说的这一转变。



网络文学的『精品意识』思考

网络文学应该面向精神史写作

□周志强

的匮乏意识,其叙事逻辑呈现为想象的“匮乏机制”,从而与经典文学写作中的审美拯救意识和理性反思驱动有了关键性的区别。后者更致力于构造共同体的政治整合、思想认同和话语召唤机制。在这里,由于写作伦理所依托的社会文化机制不同,网络文学与经典文学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写作伦理。

美国学者布鲁姆提出,经典文学创作者往往会受到前人经典作者的内在影响,并产生抗拒影响的冲动,这就形成了“影响的焦虑”。所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这种焦虑呈现为强烈的“精品意识”:如何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独特创造,创生出流传千古的作品,这是传统经典

“影响的焦虑”

网络文学的写作伦理植根于特定社会生活

文学作者的潜意识冲动。而建立在“匮乏机制”基础上的网络文学写作之所以形成了“另一个文学传统”,究其文体哲学的原因,正是这种影响焦虑的消解。

经典文学的影响焦虑主要体现为如何参与到传统文学经典的对话序列之中。话语的接续、相似和独创,成为其写作的内在意识。对已有的、大家都理解的“现实”和“命题”进行书写,获得读者的普遍性思想认同,这是其写作的内在伦理。

网络文学不再背负这种影响的焦虑。其写作伦理更多地受到一个社会内部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甚至是自觉地接受这种影响。与经典文学不同,网络文学创作不是焦虑性写作,而是去焦虑化的写作,即不在意是否获得体制和社会理性的认同。不再背负经典写作的传统这就使得网络文学可以将“潜在真实”“解放”出来。

走向“精神史写作”

既然网络文学消解了传统经典的影响焦虑,陷入自然、自在与自治的写作伦理,那么网络文学如何出精品,这个命题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传统经典文学写作的“精品意识”与网络文学写作的精品意识有巨大不同。流量、IP等肯定是网络文学精品意识的内在主导话语,除此之外,网络文学不是通过追求宏大的史诗意识或者深刻的理性认知来构建其精品意识的,而是通过“潜在真实”的解放来呈现特定的精品意识。

这两种精品意识的不同何在?正典文学的精品意识可以称之为一种“面向思想史写作”的意识。网络文学的精品意识应该培养一种“面向精神史写作”的意识。特定历史时段总是出现有不同形态的“思想”,但是这些不同的思想却有可能处于同一种“精神”时段。如今,社会的整个思想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元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呈现截然不同的思想景观,然而,对于“绝对性”的追求却并未改变。

这就有了两种形式的写作:基于特定思想时段的思想史类型的写作和基于集体无意识的感悟的精神史类型的写作。如《班主任》和《男人的

一半是女人》这两部作品,前者体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印记和政治思想的要求,后者则在无意识层面上呈现出理性和科学复苏的时段间人们精神世界的沉重、彷徨和犹豫。前者符合时代的要求,后者更多地疏离了时代的直接干预,却成为中国人精神史的活现。

同样,常书欣的《余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制文学”,而是通过一个小警官的逆袭,呈现了当下社会普通人卑弱、琐碎以及对破坏力的渴望的精神景观。周浩晖的“罗飞系列”没有确立法治社会的正确性,却凸显出犯罪事件中法理冲突带给我们的道德困境和认知两难——这种“两难”,不正是我们所处的纠缠矛盾的精神状况的现实吗?紫金陈的《坏小孩》(隐秘的角落)也不是对现在社会道德力量和法治精神的呼唤,而是有力地把一种“凄凄惶惶”的社会意识奇特地呈现给了我们。与此同时,《余罪》在逆袭狂欢中尝试重新确立法律精神和启蒙理性相结合,《坏小孩》则呈现“恶之花”的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抗争态度。

显然,网络文学自然、自在和自治的写作伦理,使之更有可能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只有不跟个人生活经验靠太近,乃至跟时代有疏离,才可能真正写出时代的精神史。所以,网络文学没有呈现出对生活的“即时反映”的倾向,而是更多地植根于匮乏机制,构造想象界的大爆发;同时,又在这种爆发中,潜存创生精神史的历史寓言。

鼓励网络文学面向精神史写作的意识,而不是面向个人生活,过分强调欲望经验,或者陷入纯欲望写作的“爽感”,才有可能在尊重网络文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培养新型精品和新型经典。我也期待网络作家很好地理解网络精品文学写作伦理的核心矛盾,通过“爽”形成与社会生活的潜在对话,也在“爽”中巧妙勾画特定时代的精神史图景,而不是思想史的图解,更不能陷入伪经验的陷阱。

总之,“爽”只是满足匮乏的外壳,而匮乏本身有可能成为精神史的突破口。网络文学归根到底不同于正典文学,无法完全接受正典文学的召唤,也无法改造为正典文学。认识到两种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的不同,才是正确引导和建立网络文学精品话语的核心所在。